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陈晋 著

左
时
代

的脉络和记忆

——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陈晋 III 著

大时代

DASHIDAI DE MAILUO HE JIYI

的脉络和记忆

——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

广东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时代的脉络和记忆：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陈晋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406-7621-6

I .大… II .陈… III .中国—现代史—研究 IV .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44922号

策 划：何祖敏 吴曼华
责任编辑：吴曼华 戴 森
责任技编：杨启承
装帧设计：陈国梁 何 维

(本书中部分图片无法与其著作权人取得联系，已将
稿酬寄送至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收转。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中山市南荫大车工业区东槿片)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7.75印张 355 000字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6-7621-6

定价：2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87621848

目录

1.永远的五四\ 1

五四为什么永远? \ 3

五四怎么样永远? \ 13

不同视野下的五四运动\不同时代的“对话”主题\永远的五四，永远的青年

2.眺望长征\ 27

航道里流淌着思想\ 生命达到怎样的高度\
凝聚之力\ 不褪色的精神名片

3.抗战与中国之命运\ 49

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 51

把国家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民族复兴的空前转折\走向未来的深远启示

又一个甲申，又一出“大戏” \ 60

握紧未来的钥匙\ 65



4. 开国气象\ 71

1947：走向大转折\ 73

年代的意义\ “大历史” 面面观\ 1947年的历史谜
底

1949：和历史约会\ 82

大变局的神韵\ 一路悲欢\ 人心挪移\ 民主演示 \ 和
历史约会

开国初期的年份记忆\ 97

告别（1950年）\ 为了和平（1951年）\ 重整河
山（1952年）\ 大工业的梦想（1953年）\ 秩序
（1954年）\ 高潮（1955年）\ 春天（1956年）

典型决策：一个经济，一个外交\ 108

陈云与新中国粮食制度的“统购统销”\ 周恩来
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情感外交”

典型人格：一个将军和一个士兵\ 117

关于王震\ 关于雷锋

5. 改革年代\ 129

世纪主题与世纪小平\ 131

世纪接力和世纪主题\ 人生积累和决策风格

改革初期的年份记忆\ 150

转折（1978年）\新气象（1979年）\了结与开拓（1980年）\多彩时节（1981年）\坐标（1982年）\重建秩序（1983年）\四季都在收获（1984年）

改革年代的精神家园\ 161

“精神基石”一解\“艰苦奋斗”新说\“民气”感言\新世纪门槛话创新

改革年代的成长困惑\ 178

在我们曾经的路上，他们无奈行走\在我们疏远的地方，他们捡拾真谛\在我们唱主角的社会，他们发现缺陷\在想象的世界，他们尝试逃离和漂泊

文化新路的前进方向\ 189

文化讨论向何处去？\什么是“先进文化”？\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几点思考

历史新路的前进规律\ 200

思想解放与常识回归\开辟新路的时候回望来路\“走路”的哲学\三十年来的前进局面

附：域外大国之思\ 215

大国来自何处？\大国要干什么？\大国走向哪里？



6. 让历史和人物鲜活起来\ 229

把“旧闻”做成“新闻”

——关于毛泽东\ 231

换一种叙述方式\ “我”眼中的毛泽东\ “还原”

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有个性，才有空间\ 《走近毛泽东》与电影思维

总理角色的历史含量

——关于周恩来\ 243

坚持真实，才会拥有感动

——关于邓小平\ 249

领袖人物与时代\ 关于电影纪录片《小平您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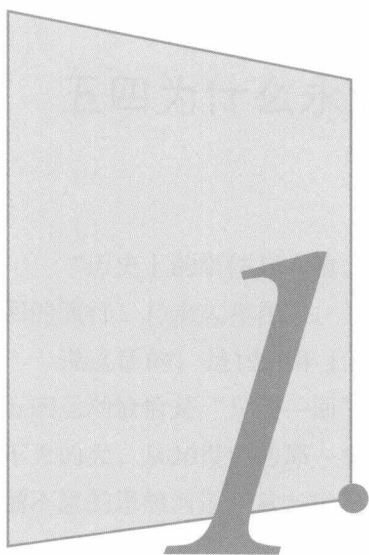
大时代的魅力

——关于新中国\ 260

党史的写法与传播\ 266

党史研究的科学理性和文情翅膀\ 一个范例\ 党史期刊的来路和去向

后记\ 278



永远的五四

YONGYUAN DE WUSI



五四为什么永远？

“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是只过一趟的，是只演一回的”，“此一回的演行，乃永久存在”。

说这话的，是1919年上演的五四运动的思想界领袖之一李大钊。五四运动恰恰是“只演一回”却能贯注于后世的历史大戏。它如同一团不灭的火，从20世纪的那一头燃到了20世纪的这一头。它也像是一条前涌不息的思想河道，从20世纪的那一头流到了20世纪的这一头。

—

说五四，人们自然会想到爱国。

那时的爱国，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像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给日本这样的民族耻辱，在中国近代史上比比皆是。但唯独1919年的这一次，激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人民运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人经历了难以承受的从大喜到大悲的心理落差。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加入协约国，并派出大量劳工到欧洲战场上做笨重体力活的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跻身于战胜国的阵营。狂喜的国人第一个冲动，就是跑到东单北大街拆掉了“克林德碑”。这块碑是中国进入20世纪的一个象征：1900

五四运动时的纪念章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27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成员，在巴黎举行处置战败国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团出席。会议决定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不合理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回中国，激起了国人强烈反对。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义和团打死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清政府为了表示谢罪，建造了这个“克林德碑”，上面还刻有光绪皇帝写的谢罪文辞。人们把这块

碑移到了中央公园，在上面重新刻上四个大字：“公理战胜”。

这四个字的“著作权”属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他当时正主导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决诸种问题的巴黎和会。

“公理”真的能战胜强权吗？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除了能够带回来一些被战败国德国早先掠去的古代天文仪器外，传回来的却是更加耻辱的消息：在会议的绝大多数议题上，中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参加讨论的资格，一切都由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少数几个国家闭门商定。中国事实上无法去分享战胜国的果实，唯一的期望是收回德国从前占据山东的各项特权。但就是这仅有的指望也很快化为泡影。日本代表以在战争期间日本与中国北洋政府早有协议为由，拒绝交还它已经占有的青岛和胶济铁路。这种失望，对国人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的《上海学生罢课宣言》就写道：

“威尔逊曾告诉我们，在战后缔结的条约里，像中国这种不好黷武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他更告诉过我们，不会承认秘密盟约和在威胁下签订的协定。我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

不仅中国人失望，连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斯也颇为感慨地表示：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一样对巴黎和会抱着如此大的期望。那些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头们的决定，使中国人一下子坠入了黑暗的深渊。我一想到中国人将如何来承受这个打击，心里就感到沮丧。

中国再一次成为被列强玩弄的对象。近代以来普遍积累的受伤的民

族感情，近代以来潜行的民族意志力和凝聚力，就这样超乎想象地来了一次大爆发。在爆发中，人们普遍地把国家的命运同个人的生命及其价值完全融为一体。1919年5月16日发表在《民国日报》上的《北京国民大学全体学生敬告邦人书》中的一段文字，可窥一斑：“呜呼！神州有陆沉之惨，五胡有猾夏之忧。当国家存亡之际，正吾人死生之关。苟欲求生，必自救亡始……当各鼓热心一致力争。争而不得，以死继之。”当时的一些团体和报刊，还公布过所收到的一些人为国难自杀的绝命书。

一些知识分子在此前后的爱国情怀，更是绽放出五花八门的个性风采。这里有李大钊的“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为青春中国之再生”的抗争、期待和豪气；有鲁迅那种因爱之愈深、痛之愈切，而诅咒“吃人筵席”的尖刻、冷峻和深邃；有郭沫若那种“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的浪漫、执著与奇谲；还有郁达夫那样的“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的急迫、忧虑和感伤。

这些爱国感情和精神，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创造的力量、心理的力量、思考的力量。他们既为再造中华而“呐喊”，又为暂时还看不到黑暗尽头的微曦而“彷徨”，最终，五四的爱国精神转向整个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涅槃”。受《新青年》鼓舞而由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其英文名字就是Renaissance（文艺复兴）。

显然，五四之爱国精神，已经远远溢出引爆这场运动的事件本身，以至后人在谈论五四的时候，想起的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天下午，一个叫匡互生的学生在赵家楼放的那一把火，它的直接目的和现实胜利——拒签“巴黎和约”——甚至也渐渐淡出视线。五四之所以永远，恰恰在于它的精神溢出效应，在于它同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爱国运动都不同。

二

有什么不同？主要是因为和五四爱国运动相生相伴的还有一个运动，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人说的“五四运动”，绝不单指1919年



5月4日开始的游行、罢课、罢工、罢市这样一些具体的社会运动，而同时指在此前后知识界推动的，一段影响现代中国发展方向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灵魂的思想文化历程。五四爱国运动正是在这段思想文化历程中孕育出来的，并使它绽放出与此前任何一场爱国运动都不一样的品质和风采。

用列宁的话说，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不是中国历史上爱国传统的简单重复，在于它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国难当头的爱国热潮更广泛、更深刻，在于它不是以政治统治权力为依托，不为个人功名所束缚，在于它拥有横空出世的新的诉求，在于它寻找到了新的精神太阳——这就是人民群众自觉参与的民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有一个并不值得称道的信念，即：在忠孝道

1919年5月7日，在各界声援下，被捕学生获释，图为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返校后，受到热烈欢迎，被抬举者左起：唐英国、赵允刚、薛荣舟、初大告、向大光、杨明轩、王德润、陈苾民

影 攝時校近日七生學國愛師高京北之留拘被會大街遊界學京北日四月五年八國民華中



德观的支配下，皇家等于国家，爱国报国的一个重要标尺，是忠君保皇，志士们难以超越这一历史局限。无论是战死疆场，还是推动变法，都首先是为了李唐王朝、赵宋江山、朱明社稷、满清天下……于是，他们的爱国理想，都只是维持和修补皇权之下的社会秩序，而不论这种秩序是否合理。他们的爱国思想和抱负，也无非是向“官家”奏陈一些保国、治国的政策方略，以求“太平盛世”，倘若遇到昏君奸臣，便只能发出“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悲叹。在五四运动之前不到2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也是因为提出了“扶清灭洋”这样的口号，才为慈禧太后许可和借用。

辛亥革命，使长期统治中国的皇权政治轴心彻底崩塌。北洋政府上演的种种闹剧，使先进分子不再对它抱任何幻想，走马灯似的、以私利为计的“内阁”政权失去了控制思想界的权威和能力。于是，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从根本上超越了历史局限，既不是借古人之魂去扶起已经倾倒了的政治轴心，也不是借爱国之名去维护已经倾倒了旧的道德价值体系，而是把爱国主义精神同反帝反封建这一深刻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了，甚至把矛头直指当时的政府。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说：“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就是错的。”

五四青年们，就这样挟带着前所未有“思想装备”登场了，由此使这场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实践。

一位北大学生后来回忆说：记得5月2日晚上，我们很少睡觉。我和一群朋友谈了整整一夜。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跟政府毫无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希望。而且也不能依赖所谓的伟大领袖像威尔逊这种人的原则。看看我们的同胞，看看那些可怜无知的大众，不能不觉得我们必须而奋斗。

从运动一开始，一些哪怕不属于思想界领袖的人，也有一种超越运动直接目的的政治思考。例如，北大学生罗家伦，在五四高潮中就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文中特别声明：我们运动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其实这两句话就是五四那天他本人写的宣



言中提出来的)，而在于三种精神，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一是社会制裁的精神（即社会舆论对政府的压力），一是民众自决的精神，这三种精神是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这三种精神所彰显的爱国主义，体现出从我做起的民主诉求。当时在武汉呼应的恽代英便写信给胡适说：“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自己要是不真心救，就是亡国奴的本性了。”在湖南呼应的毛泽东，更是喊出了：“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些都表明，一种以民主为灵魂的新的爱国主义观念诞生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各式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时期的青年人当中有那样大的影响。因为无政府主义在当时恰恰是独立于政府之外，来着手改革社会并动摇政府权威的现成的思想武器。

不再寄希望当政者，转而唤起民众以寻求救亡爱国的新途径，是五四参加者普遍的自觉意识。即使老一辈的革命家如孙中山，也感觉到了这场爱国运动的新意所在。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孙中山在上海。他是因为在广州发动护法战争失败后，被桂系军阀排挤走的。恰恰是五四给了他很大启发，他说：“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如果说这个启发还是一般性的感叹的话，那么，结合他当时从事的政治革命实践，他甚至想过，也可以采用五四这种斗争形式来达到目的。1919年10月18日，他对上海的学生会有一个演讲，里面说到：“救吾民国，惟有两途。”那两个途径呢，他说一是维持他在1912年3月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经营的中华民国约法，一是从头再举革命之事业。“如使诸君即时以正当方法结合，要求在国会政治之下，回复诸君自己之权，吾敢断言，诸君之必成功。”这里的所谓“结合”，其意同毛泽东当时说的“民众大联合”大体相似。老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在1959年也曾谈到五四。他说：“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

三

五四之所以永远，还在于它有一层更深刻的灵魂——科学！

只有民主与科学的联姻，才会结出永不凋谢的精神花朵；只有民主和科学两颗太阳的相互辉映，才能发出永不消减的光芒。

五四提倡的科学精神是什么，可以有各种概括，我以为最根本的内涵，应该是通过思想解放，寻找一条新的可行的救国强国之道。

科学精神在封建王朝被推倒仅仅几年后，便成为知识界的普遍共识，这要归功于五四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精神界领袖倡导和传播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举动。那时候，动不动说什么主义，成了知识界的一种时髦。在长沙的青年毛泽东形容说：这些新思潮的传播，就像洞庭湖的闸门打开了一样，席卷一切，顺它的生，逆它的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想和思潮的呈现、探讨和碰撞，从本质上说，是从不同角度寻求和提出怎样才能拯救中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样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胡适在1922年回忆说：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新派期刊仅《新青年》、《新潮》等不超过10种，而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半年中，中国出现了大约400种新的白话文期刊，大约350种周报，而且，皆以“传播新思想，改造旧社会”为己任。各种思潮和主张背后的支点，都是救国强国的信念。这才是目的，五花八门的口号只是思路 and 手段。那些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青年人，无不是在对各种各样的强国思路和手段的比较选择中确立起自己的信念的。

确立目的，受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一时代精神的支配；选择手段，却是囿于每个人的人生经历、知识背景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和对现实国情的了解、洞悉程度。一场带来历史转折的气势磅礴的运动，在爱国主义手段的选择上，必然是众声喧嚣、泥沙俱下。而且，在这个运动的初期，囿于当时的历史前提和时代氛围，每一种选择都多少带有简单化的理想主义色彩。

科学这个口号，在五四时期发挥的效用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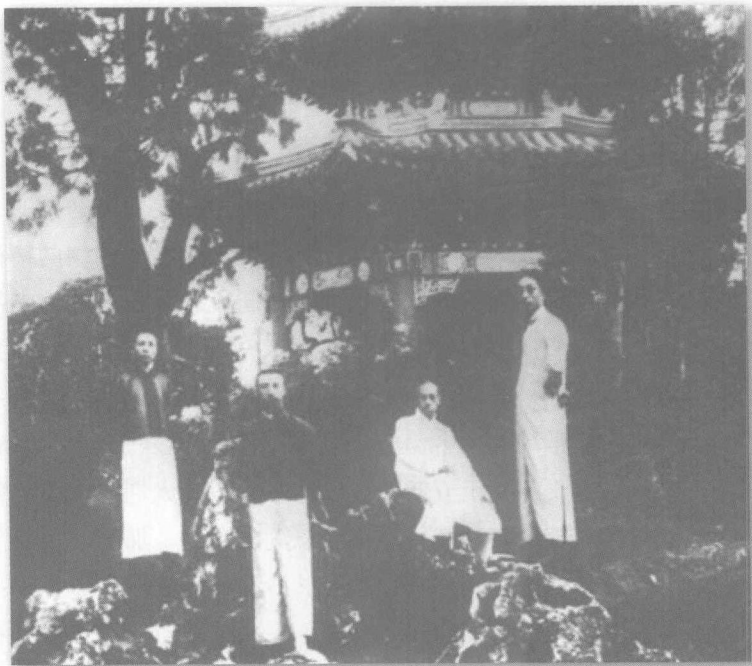
效用，就是启发人们对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思考和选择，进而对中国社会改造之途进行理性的设计。

固然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各种道路之间，毕竟有高下、缓急之分，有根末、效用之别。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后，

越来越多的人信奉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它是拯救、改造和发展中国的最有效的途径。人们选择它，也是经过苦苦思索的，是对各种救国学说和主义的反复比较和缜密思考的结果。1920年底毛泽东说他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

关于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毛泽东于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个相当明确的解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重要前提：无论选择和引进什么思想、主义，都是为了探索“国家的命运”，解决“自己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因为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它在中国迅速传播，并给当时在思想上徘徊无路、精神上焦渴无比的中国先进分子带来了两个最重要



1919年李大钊(中)与张申府(右一)、梁漱溟(右二)、雷国能(左)在北京中央公园